

戴著思想的枷鎖翩翩起舞：

張素華新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評介

◎ 董國強

給一篇嚴肅的學術書評起這麼個奇怪的標題，並不是想刻意搞怪，而是力圖向讀者呈現我讀過《變局》一書後的第一印象。這裏所謂「戴著思想的枷鎖翩翩起舞」的人，實際上分為兩組：一組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主張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朱德、陳雲等歷史人物，另一組則是《變局》作者張素華以及參加該書「斟酌」、並提出許多「中肯意見」的「領導和專家」們。

首先必須承認，《變局》一書是作者積數年之功完成的一部研究性著作。該書以大量檔案文獻、親歷者的日記和回憶錄，以及一些知情人的訪談資料為依據，觀點和結論的確有許多不同凡響之處。該書封底的推介性文字稱其「第一次全面、深入、細緻地披露了七千人大會的緣由、經過和曲折的全過程，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以及對各省委、縣委負責人的情況，都有詳細的分析。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填補了黨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並非毫無來由的空洞讚譽。而該書在出版後的3個月裏4次印刷（筆者手上的書是第4次印刷本，印數標明46000冊），也足以反映該書受到各界歡迎的程度。

這是一本以淺近的口語體風格寫作的學術著作。這種著述風格的形成，一方面可能與該書所引用的原始素材的類型有關——該書中引用的「檔案文獻」也多為與會者的發言記錄，另一方面可能也與作者力求通俗的寫作指導思想有關。平心而論，這種著述風格的突出優點是生動、親切；突出缺點是拖遝、散漫。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該書的內容。作者在〈前言〉中說：本書「力求從史的角度盡其所能對大會作出客觀的介紹和評價，既不以我們現在對『大躍進』的理解，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去檢驗當時的領袖和人們，也不回避問題，貶損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將它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實事求是地來考察這次大會的人和事」（《變局》頁5，以下出自該書引文均只注明頁碼）。這個指導思想的確大大提升了該書的品位。

我們以前只是大概地知道，這次大會是「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的大會」。讀過該書以後我們才發現，「批評與自我批評」氛圍的形成，乃是三年困難時期中央與地方矛盾不斷激化的產物。中央召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初始動機，是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鄧、周、陳等人試圖通過行政高壓手段解決糧食徵購問題，確保工業生產和城市供應的需要。然而另一個客觀情況是，經過前幾年的「高估產」和「高徵購」，廣大農村已經處在嚴重的饑饉之中，全國餓死的農民數以千萬計，所以各級地方政府根本無法完成中央下達的糧食徵購任務。於是出現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幹部各執一詞、相互指責的局面：中央

領導人提出要反對各級地方幹部的「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而地方幹部則對中央領導人的「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提出批評。而且由於糧食緊張與「大躍進」失誤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所以雙方的爭論焦點很快便由糧食征購指標的高低問題轉向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和以往工作失誤的責任問題。毛澤東比劉、鄧、周、陳等人的高明之處在於，當他了解到地方幹部的抵觸情緒之後，果斷指示將大會報告的指導思想由最初的「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改為「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結，加強紀律，加強集中統一，鼓足幹勁，做好工作，戰勝困難」，而且提出以往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要由中央負責，第二要由省委負責，然後才是地委和縣委負責的看法。這就大大淡化了中央向地方「問責」的意味。此後大會的基調很快由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之間的「頂牛」變成了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由此可見，當時中央領導人所面臨的，其實是由糧食危機所引發的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而「批評和自我批評」不過是當時條件下化解危機的一種手段。

其次，我們以前只是一般地知道，這次大會是「努力面對現實，認真總結應驗、糾正錯誤的大會」，「會議對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鬥方面起了積極作用」（頁4）。而且在以往的相關論著中，毛澤東在會前和大會期間的幾次自我批評表態被大書特書，成為黨內民主的一個典範。讀過該書以後我們才知道，所謂「面對現實，糾正錯誤」的實質性舉措，僅限於經濟工作方面的局部的、技術性的政策調整，而在至關重要的「大躍進」失誤的責任問題上並沒有真正達成共識。所謂「黨內團結」最終是通過「和稀泥」的方式實現的。當「錯誤不可能不犯」、「錯誤人人有份」成為一個虛假的共識之後，各級地方幹部一方面得到了向上級領導發牢騷、提意見、「出氣」的機會，另一方面擺脫了一貫的「替罪羊」的角色，自然是如釋重負。然而這種虛假共識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毛澤東本人。也正因為他內心深處顯然十分清楚自己應負的責任，因而當他十分巧妙地使大會的鬥爭矛頭集中指向負責具體工作的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委之後，又通過各種方式暗示了「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結果在這次大會上，只有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一個人受到組織處分。這恐怕是最終促成皆大歡喜結局的一個關鍵因素。

基於上述內容，作者一方面肯定這次大會使全黨恢復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真總結了過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統一了認識，團結了全黨，振奮了精神，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這次大會的一些歷史局限：第一，這次大會雖然對「大躍進」期間的一些錯誤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卻沒有從「三面紅旗」這個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導思想方面來總結經驗教訓；其次，雖然這次大會已經認識到最大的經驗教訓是黨內缺乏民主，但對於如何保證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實行，則沒有進行深入的討論，更沒有任何制度方面的創獲；再次，林彪在會上作的鼓吹個人崇拜、掩飾毛澤東個人錯誤的講話，產生了相當的消極影響。在「捍衛旗幟」的主基調下，即使是劉少奇的書面報告，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有不夠實事求是的地方。

作者在書中強調指出：「黨內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氣氛，是『大躍進』失敗更深層次的原因」（頁66），而「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問題，恰恰首先來自毛澤東本身」（頁169）。她還指出：「那些害怕『觀潮派』、『秋後算賬』的人，考慮更多的恐怕是個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許講『大躍進』的成績，不能講『大躍進』錯誤的，要麼是脫離實際，要麼是出於利益的考慮」（頁85）。以毛澤東本人為例，他雖然率先做了自我檢討，表示他「要負責任，但是具體地說他要負哪些責任，到底犯了哪些錯誤，則沒有詳述」，因此「總的來看，給人的印象是，毛澤東未能徹底放下包袱，在個人得失方面想的多一些」（頁170）。作者的這些看法，

無論是在對問題癥結的判斷上，還是在對毛澤東的個性及其晚年思想狀況的把握上，都是比較準確、比較深刻的。

循著這個思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毛澤東會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劉少奇產生不滿。

「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頁284）。作者還指出：如果說「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還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那麼「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此後毛、劉之間的一系列意見分歧，「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鬥爭的錯覺」（頁287-288）。由此可見，毛澤東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與「大躍進」以來毛、劉之間的政治分歧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而「七千人大會」以後毛、劉之間政治分歧的發展和加劇，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個人「葉公好龍」、「疑心生暗鬼」的結果。

由於本書匯集了大量的原始素材，而且這些原始素材具有不同的觀察角度，所以筆者相信有心的讀者在通讀全書以後，不但可以對「七千人大會」召開的背景、會議經過和後續影響獲得系統全面的理性認知，而且還會在腦海裏生成眾多歷史人物的生動影像，比如毛澤東自以為是、文過飾非，劉少奇職責所在、慷慨陳詞，鄧小平、周恩來等人對「三面紅旗」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朱德、陳雲等人畏毛如虎、委曲求全，林彪、陳伯達等人工於心計、居心叵測，無一不躍然紙上、呼之欲出。因此，就筆者的個人觀感而言，作者的有些解說確實可以幫助缺乏背景知識的年輕讀者理解當時的歷史語境，有些則顯得過於瑣屑累贅，甚至構成影響讀者自主視聽的眩光和噪音。套用書中所引的三位陝西黨員農民給中央聯名信中的一句話：「這種情況，已經是一望而知的事實，用不著連篇累牘地再行分析了」（頁76）！

那麼為甚麼作者會在書中加上那麼多喋喋不休、前後矛盾的解說呢？如果我們仔細玩味一下該書的〈後記〉和〈編輯說明〉，大概不難推測出其中的奧秘。另外，作者在〈後記〉中還說：該書有「不少地方寫得還不到位」。如果我們回到書中那些結束得十分突兀、並在句末打了省略號和驚歎號的地方去仔細揣摩，就會發現這句話恐怕並非完全是作者的自謙之詞。

最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用「戴著思想的枷鎖翩翩起舞」來形容我對書中眾多歷史人物和該書作者的直觀感受，並非全是貶抑之意。從某種意義上講，帶著枷鎖跳舞的人更加值得我們欽佩。因為他們本來可以但卻沒有選擇「放棄」。

董國強 南京大學歷史系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七期 2007年10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七期（2007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